

毒性话语^①

[美]哈佛大学 劳伦斯·布尔 [方红 于群译]

摘要: 本文提出毒性话语的概念,阐明毒性话语四个主要特征。毒性话语概念的提出,打破自然写作与环境文学的界限,解构了人类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的二元对立,体现了融自然保护主义思想、环境正义性原则为一体的生态平民主义思想。

关键词: 毒性话语;生态平民思想;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复杂田园意识

作者简介: 劳伦斯·布尔现为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美国生态批评中环境理论的奠基人,主要从事美国先验主义文学传统、生态批评与美国环境文学研究。译者电子邮箱:fanghong@nju.edu.cn。

对中毒世界的畏惧不断被报道,也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论,人们主要从医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角度披露、反映中毒世界引发的恐慌,然而将毒性作为文本研究还很少见。本文重在界定毒性修辞的形式、起源、功用,揭示对其进行解读的潜在意义,说明毒性修辞具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特征,这些特征既反映工业化文化引起的焦虑,也受制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价值的影响。为使文中的分析更有针对性和可操控性,不超越我的知识水平之外,文章将以美国为主,其中许多观点也适用于世界范围内其他讲英语的区域,希望也包含一些受到西方环境制度影响的地区。

文中我们会发现,毒性话语质疑人们对环境运动与环境伦理的传统理解;呼唤美国环境主义新时代的诞生:在新时代中,自然保护主义者穆尔和城市社会改革家亚当姆斯被置于相同的叙述语境中。毒性话语坚持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价值观相互依存的关系,表明环境理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是:它须比已往更加注重人类与社会的健康。部分出于这个考虑,毒性话语提出重新考虑影响文本阐释的某些常规期待,打破自然写作与环境文学的传统界限,揭示将注重移情的文本阐释方式与侧重怀疑态度的解读方式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会引发的问题与危险,表明在选择比喻阐释自己立场与观点方面存在伦理上的可行与对否的问题。

相比毒性在化学、医学、社会学和法学方面的研究,毒性话语研究没有受到同等的重视,这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实用主义在讨论的先后顺序形成过程中起到的主导作用。当健康和财物尚处于风险中时,文本就被看作是次要的了。即使最具人文思想的学者都不会赞同爱默生的信条——最抽象的真理就是最实际的。第二个原因与从话语视角研究环境问题的潜在研究者所采用的方式有关。在文学和修辞学中,推动环境问题研究的动力主要是所谓的生态批评运动,今日看来,这项运动的推动力有两个主要的伦理、政治目标:1. 保护濒临灭绝的自然世界;2. 重新唤起人类与自然交融的意识——人类曾经经历的、或者可以借助想象展开的,尽管这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自然因工业化与后现代化而面临灭绝的威胁。当代的生态批评尽管重视恢复人类与自然的交融关系,它对毒性本身的关注非常有限。喜欢从文本形式探讨环境问题的另一学科途径是文化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倾向于把自然环境当作社会建构的产物,视其为一种附着现象,是政治或经济力量的反映,或是文化争议的场所。因此前种类型的生态批评缺乏认识论和政治上的深刻思考,而文化研究式生态批评又急于解构自然环境,将其神秘化或看作政治舞台。我这样讲并不是忘恩负义,其实我从两种类型生态批评中受益颇多,尤其是前者,但我仍希望这两者之间能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展示这两者结合的一种方式,并说明这种结合是有益的。

人们早就感到毒性的威胁,这种担忧不只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甚至可以追溯到晚古时期,但近年来这种迫切感却急剧传播开来。拉夫河、三里岛、博帕尔、切尔诺贝利、瓦尔德兹:这些现代偈语既指一些真实发生了的事情,又指后工业梦想实现过程中将要不断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表明由广岛和长崎核爆炸引发的环境灾难,在冷战之后还会继续。即使当今世界精英专属区域也表现出社会理论学家贝克(Beck, 1992: 51)所说的“风险社会”的一些特征。这个“风险社会”呈现一种“悲情化”状态(同上, 1992: 49),其特征是因无助引发焦虑而形成的团结,因为即使有科学相助,也无法估计日常工作带来的致命后果。与此同时,在非精英阶层中,人们很快因意识到毒性危险而觉醒,采取绿色行动。在美国,反毒性运动改变了环境主义的面貌,环境主义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拉夫河争端而引发的一场大规模运动,之后,由小范围郊区的骚动扩展到由五千个左右社团参与的全国性联合行动。

主流环保团体所倡导的自然保护行动,经费充足,组织成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尤其是男性);而当今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环境正义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反对有毒物质排放起着催化作用并被置于中心地位),其领导阶层逐步由非精英人士、经常是女性担当,当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少数族裔,这是可以理

解的,因为废物填埋区与其他污染源的位置具有典型性^②:“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被平等地毒害着。”(Dowie, 1995: 141)这些新时代的活动家并不太在意要与主流环保者们为伍,相反,他们很可能瞧不起那些人,称其为“吻鸟者与抱树者”(Regan, 1993: 7)。“在他们过去的生活中,”该运动的一位早期领袖曾写道,“每个人都过着极度个人的生活,关注个体直接感受,不想费神去了解所谓‘政治’事件……没人愿意卷入其中,至多可以听他们说:出于义务勉强可以做一点,因为总得有人去做。随后他们在参与过程中发现理想破灭了,便义愤填膺,转而猛批社会、企业与政府。”(Szasz, 1994: 97)

20世纪90年代出现这样的趋势:生态正义行动开始与传统环保主义宗旨相结合,1991年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各色人种环保领袖峰会”所颁布的17条宣言前两条条款便是这样一个例证:(1)“环境公平肯定‘大地母亲’的神圣性,生态系统的统一性,所有物种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它们有权要求避免生态性毁灭”;(2)“环境正义性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基于相互间的尊重与公正,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避免任何形式的歧视和偏见”。这些条款兼容并蓄,融合了旧时代美国民主宗教的风格、60年代公民权利保障的内容、美国原著民的灵性思想以及保护主义伦理观。而当代生态平民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非精英运动、注重社区、将环境保护重新界定为实现社会公正的一种方式。

即使环境正义理论对大多数立法者来说过于理想化和派系化,使他们无法接受,但人们对环境中毒的恐惧还是不断赋予其力量;对环境中毒的恐惧很有可能一直是公众关注的问题,就像冷战时代的核恐惧一样,尤其是未来还会有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灾害事件将被频频曝光。毒性话语通过媒体折射出的视觉力量,对促进立法严控污染排放、在新的污染填埋地建立隔离墙,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也迫使企业采取“自愿”行动,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其中一种自愿举措是使工业离岸——将服装厂迁至拉美与东南亚,将垃圾装船运往非洲——从而加剧全球的生态不平等,几乎接近勒菲布福赫(Lefebvre, 1991: 282)所预言的、反乌托邦的现代化末日:整个地球在资本主义的“三圣合一”(土地—资本—人力)统治中重组,成为相互分割、等级森严的“抽象空间”。而这种全球性影响证实毒性话语的潜在性,即使它没有影响到国家领导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也影响到他们的话语修辞。在1996年8月竞选提名通过后的演说中,克林顿总统道出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美国有一千万12岁以下的儿童住在离毒物填埋地三英里的地方。在普通民众层面,最近民意调查,如对西海岸居住者中五个不同群体的调查,表明大家对一些观点具有强烈共识,如“健康的环境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Kempton, Boster & Hartley, 1995: 259)。在发展中国家,毒性对人民生活的威胁

程度更深,更加迫切需要将环境问题置于传统的自然保护主义之上,并以此为坚实的基础。

当代毒性话语真正开始于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一书,该书第一章“明日寓言”中引入了毒性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意象:一个“位于美国中心地带”的小镇,在一个没有鸟鸣、没有花开的春日中醒来。“这个小镇实际上并不存在”(Carson, 1962: 13),卡森在描述完这一意象后写道,“但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很容易找到上千个这样的市镇”,因为“可怕的幽灵已不知不觉地笼罩在我们身上,上述想象中的悲剧可能很快就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Carson, 1962: 14-15);接着她着重谴责了DDT的使用,对普通化学杀虫剂也进行了申诉。

媒体对拉夫河事件的报道展现了类似社区被破坏的意象,在播放貌似正常、普通的画面的同时,解说员却在叙述截然相反的内容;(画面)为一个男孩正沿着一条郊外街道骑着自行车,解说员说道:“这一带的家庭中有天生残疾和母亲流产的事件发生……”解说员继续说道:“这些公共场地(校园、郊野、房屋后院),本该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现在却显得植被稀薄、枝叶濒死,随处可见充斥着非自然的化学液体的坑洞;房屋庭院和地下室到处都被渗透出的化学物品侵蚀;人们的生活被搅得乱七八糟”,这是充斥在这些新闻故事中最频繁、最持久的画面,这些画面不仅与《寂静的春天》中的画面相互呼应,也与当地居民对自己生活的描述极为一致。正如拉夫河事件中主张采取行动的领导人路易斯·吉布斯声称,1972年刚到这里时她“根本不知道那里有条拉夫河。那个小区位于一片静谧的居住地,环境宜人,树木繁多,儿童在室外嬉戏,看上去真的很适合我们一家”。她的觉醒过程很缓慢,而被背叛的感觉就像当初的天真一样的决绝。一天她在“私有房主协会”开完会后回家,同伴的一席话令她瞠目结舌:“你可以闭上眼睛,走上街头,单单靠气味就能说出雨水管道的出口在哪里。这是真的,即使我被这种气味包围着,我还是不能相信污染已经到了我家。”对其他“被污染社区”的研究也展现了类似的画面(Edelstein, 1988: 11-12):一种觉醒——有时缓慢而无奈——一种可怕的发现——没有什么保护环境的神毯,那是一种错觉——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可能想到的反应,如愤怒、默许、无为、否认、绝望。

这些资料提出了无法解决的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问题。电视报道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吉布斯的自传?抑或当地居民的证词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电视节目的报道?两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寂静的春天》及其影响的作用?无论答案是什么,卡森、吉布斯或其他人的陈述都清晰地反映出一种早就存在的思想模式。卡森所预示的东西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在美国文学中存在。例如在霍桑的故事《拉普契尼的女儿》中,主人公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照看着一个奇怪的

植物园,这个植物园里种植的都是反伊甸园的有毒植物,是她那个疯狂的科学家父亲创造的。实际上,比阿特丽斯自己就带毒,乔凡尼如果想得到她,就得让自己也中毒,变成连呼吸都能让普通苍蝇和蜘蛛毙命的怪物。虽然这故事是中世纪的背景,但这一场景让人想起“技术-反乌托邦”式的重读,即霍桑在其“天国铁路”中展现的对《天路历程》的重读。以比彻(Beecher, 1986)的“被饿与被毒害的美国人”为代表、类似维多利亚时代、公共卫生专家式的报道,直接明了地探讨了霍桑拐弯抹角所暗示的内容:我们原以为舒适温暖的堡垒——资产阶级的个人小天地,实则充满了致命的毒气。

简而言之,卡森和她的平民追随者们重启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背叛的伊甸园的神话,马克斯理清了这个神话在美国的发展脉络。马克斯认为,传统的美国主流文化带有一种天真的双重意识,一方面它具有逃避主义者的幻想,想象自然之美永不枯竭;另一方面它又对国策致力推动的经济进步有种朦胧的焦虑,这种天真幼稚受到以梭罗和麦尔维尔为代表、具有独立思维与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在技术促进论和克里尔-艾夫斯式的美国田园文化习俗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矛盾。马克斯(Marx, 1964: 25)把这种普遍具有的意识称作“单纯田园”式,以区别于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复杂田园”意识。

因此,当我们发现当代毒性话语不过是重新叙述从单纯田园意识到复杂田园意识的残酷觉醒过程时,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研究城市规划和建筑的历史学家指出,美国郊区乃至城市街区的文化建造,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田园想象和价值:即对安全整洁社区的期盼、对充裕的居住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期盼,田园幻想破灭带来强烈的心理创伤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在其熟悉区域,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毫无根据、具有免疫力的主观感觉”(Douglas, 1985: 29);于是,他们在家使用洗涤剂或在花园中喷洒杀虫剂时既不看产品标签,也不采取最基本的防范措施。

正是透过玫瑰色、田园乌托邦式、天真的镜头,吉布斯第一次看到了拉夫河流域最朴素的居住地;同样透过这个天真之镜,莱格勒的居民们第一眼看到的北泽西居住区,他们带着“逃离城市寻求世外桃源”的想法在此定居(Edelstein, 1988: 55)。同样,在阿拉巴马州的萨姆特县,当地以行动抵抗组织的领导者声称,这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农业地区”(Kiker, 1990: 17),然而,这样一个人口中70%是非裔的穷县,被指定为全国最大的垃圾处理基地,这些形象化的描绘有多确切我们无法判断,很可能它们并不准确,然而,相对于它们在心理与修辞上的潜在影响,其真实性是不足为道的。

如果把生态平民主义的抗议行为与反田园主义联系到一起,可能会混淆两

者的类别。因为由梭罗和穆尔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自然保护思想,是传统田园主义继承的最重要的环境思想遗产,它是精英环境保护组织所奉行的哲学,而环境正义行动组织是在与其相对立的基础上形成与建立的。后者不仅由不同背景、不同种族成员组成,它的核心根基是人类中心论,而不是生态中心论;它关注人类居住区域胜过关注开阔地带,它更多致力于社区环境改善,而不是孤独的自然体验。然而,生态平民主义与传统的自然保护主义有着共同的信念,它们坚信生物环境应该比现在更质朴,应该是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休憩、生活的地方。因此,毒性话语以田园理想为支撑是有道理的。它使田园理想发生扭转,使其民主化:表明我们都有权拥有空气清新、水源清洁、舒适宜人、环境整洁的养育之地。

从绿洲幻想中清醒,紧接着又被另一意象所主宰:即世上没有幸免于毒性侵入的避难所,这种身陷囹圄的感觉就是《寂静的春天》传播、普及的第二个意象。卡森不断指出“有史以来第一次每个人从母体内受孕到死亡,都在被迫接触危险的化学物质”。环境正义主义活动家以多种方式展现社区、人群、最后整个地球受到神秘毒网侵害的情景,这有助于在弱势人群中培养一种群体观念:“石油从圭臣的、阿拉斯加的地里被开采,到北里士满(加利福尼亚)的炼油厂提炼,到西奥克兰高速公路沿线地区最终被燃烧,在这一过程中,穷人和有色人种为此付出代价”(Lee, 1991: 1-18);这有助于将原本不关心政治的女性发动起来,“将她们生活中特殊的健康问题与引发这些问题的外部世界的公共政策与权力联系起来”(Krauss, 1993: 109);这促使少数族裔的街坊,那些居住在危险填埋物附近街区的有色人种,去说服紧邻社区的白人居民,“社区中没有哪一个部分是自成一体的,唇亡齿寒”(Collin & Harris, 1993: 100)。全美反毒害抵抗运动创立的《每个人的后花园》的出版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正如用修辞手法展现背叛田园的意象,用修辞体现毒性相互渗透的意象既不是卡森所开创,也不仅限于环境正义运动,它通过生态灾难小说进入流行文化,这类生态小说有迪克的《安德洛伊兹梦想电羊吗?》、布鲁纳的《羊儿抬头看》、桑德斯的《培养箱》以及希尔如的《O区》等。这些作品的创作动力,如同卡森的诊断分析,来源于冷战时代的核恐惧。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际,肯尼迪总统在联合国发出警告:“该地球上每位居民必须想到不能在地球上居住的那一天。”(Weart, 1988: 215)肯尼迪也支持卡森倡导的限制使用化学杀虫剂的运动。卡森明显利用这种焦虑情绪,她把那些杀虫剂生产厂家称为“二战的孩子”(Lutts, 1985: 211),把杀虫剂带来的灾害描绘成战争场景:武器、屠杀、受难、灭绝、尸体、杀戮、征服。

将全球毒性修辞的源头确定在冷战或核时代的理论,并不能解释它的历史

和复杂性。马尔修斯因全球资源过度开采、日益被毁而产生的焦虑并不是新观念,它在环保思想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艺术保护主义者达令在一部卡通片中向大众展示了一个资源耗尽的世界,片中的地球,要么被描绘成带有巨大凹坑的球体,大坑就是原现美国的位置;要么被描绘成正在照看一把空壶的、矮小的大自然母亲,她被笼罩在阴影中,这阴影是个裹着遮羞布、手持乞讨大碗不耐烦地要吃要喝的大怪物。世界被毁灭的景象最早出现在第一部现代环保主义论著——马尔什的《人类和自然》(1864)中,这些场景与17、18世纪那些被派往一些生态脆弱的飞地(如圣海伦娜岛和毛里求斯)的欧洲民政人员所发出的警告不谋而合。

第一位黑人市长、印第安纳州盖利市的理查德·海彻尔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具有敏锐的社会公正意识,他成功地团结美国非裔人群、郊区的中产阶级和白人劳工掀起一场争取高质量空气的运动。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受到卡森的影响,他们受到毒性话语前期传统影响的可能性更小。但盖利市联盟的成功——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强烈地袭击该城市,使得失业问题盖过了其他任何一个民生问题——主要归于污染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凝聚力:污染问题是“难得将敌对社会派系联合起来的少数几个问题中的一个”(Hurley, 1995: 140),正如贝克(Beck, 1992:36)所说:“贫困令社会等级化,烟尘令社会民主化。”

在海彻尔成功组成联盟的过程中,同样起关键作用的是他的“共同敌人”策略——将环境改革与社会公正联系起来(Hurley, 1995: 112),将企业的贪婪视为“大家共同的敌人”(同上),这构成毒性话语第三个重要部分:大卫和歌利亚之间为道义进行的争斗。这一主题在美国环保思想中有两个基本渊源。正宗的源头是穆尔与品乔特为左右特雷多·罗斯福的情感思想而进行的争斗。罗斯福无法决定是否留下海彻海奇峡谷,使其成为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一部分,还是将峡谷河流拦截,为旧金山地区提供水源。穆尔谴责对手是“彻头彻尾的苦难制造者和强盗”,“想方设法让一切都变成美元”(Muir, 1907: 48),但他的谴责毫无用处,虽然当时的确让罗斯福有些惴惴不安。历史上与穆尔的斗争同时发生,但在美国环境主义史上却鲜有提及的是辛克莱的《屠场》(1906)一书的出版,这是部划时代的、黑幕揭露小说,披露了肉类包装业工人受骗受害的过程。这是毒性话语伦理感的另一个来源:它不仅揭露性叙事,还有自19世纪末就开始孕育的以城市和工厂变革为代表的系列事件与运动,包括拉什金发起的居住环境运动、愈演愈烈的劳工骚动以及工业毒物学的诞生。这两种源头并没有很快地融合在一起,一方面表明了社会各阶层的分离;另一方面显示出空间的分隔(工作地点与居住地、休闲场所的分隔,城镇与农村的分隔)。上述种种关注,海彻尔都兼容并蓄,他通过提

出盖利市所有街区和居民普遍成为牺牲品实现这种融合。

同样,卡森也打破上述分隔,只不过她站在全球的角度,这使《寂静的春天》成为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源泉。在一篇纪念性文章中,环境正义活动家路易斯(Lewis, 1991: 5)称赞该书揭露“企业势力与化学虫害控制之间扭曲的恋情”,其“对父权制暴行的控诉”具有早期女权主义的特征,这是对卡森立场的支持。卡森谴责军队、政府机构与化工公司对毫无成效的杀虫运动过于热衷,在既不顾后果也不对已知风险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分发毒药。

卡森的愤懑极少针对特定的组织与官员,主要针对一些痼疾:“撒向生命组织的化学网”;“像原始人大棒一样的简陋、粗造的武器”;“倾向称那些寻求无杀虫剂的食物的人为狂热分子或迷信分子”(Carson, 1962: 261)。这种抨击极为有力,因为它没有将自己局限于一个对手,而是小心地维持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对阵势态,既没有为默许自己成为化学产品消费者或共谋者的人开脱责任,《寂静的春天》也明确指出,普通市民是军队、企业公司和政府机构狂妄自大的牺牲品。这种责备式修辞中的泛指人称的转变,其重要性几乎不亚于控诉本身。即使是刘易斯(Lewis, 1991: 18)也提到了“我们对农业杀虫剂肆无忌惮地滥用”,只是他觉得如果卡森能加强“社会正义与环境公平、生存权与环境权”的联系就更好了。对环境正义活动家来说,即使“被唤醒”了,仍须提防漠不关心或天真无知,更要防范外来的恶势力。值得注意的是,紧随路易斯对卡森的颂扬之后,是一篇名为《与杀虫剂作战中的为与不为》的文章,言辞激烈,充满指导意味,文章最后警告说:“不要雇个专家,然后自己睡大觉。”(Martin, 1991: 4)此外,在很多情况下,将环境种族主义视为犯罪而不是特例不仅更加精准、也更加有效。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面临被侵犯的威胁是毒性话语中的重要部分。环境正义运动最主要策略之一是提高觉悟,通过增强地方认同意识、受害者意识与草根阶层的抵抗意识,强化全国范围内社区或街区的抵抗意识,抵御“不受欢迎的工业入侵和外来渗透”(Bullard, 1990: 45),这些措词揭示毒物威胁使普罗大众具备了普通的地方意识与社会身份。有机、整体主义居住社区的定义是相当有弹性的,它不仅可指具有一定历史、也自我认可的存在体,如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尔森,也可以是由数字符号指代的区域,如洛杉矶中南部邮政编码为90058的地区。(该社区是外来者的非居住天堂,1989年超过18家企业在这个社区排放了3300多万磅的化工废料。)

简而言之,毒性话语可以唤起场所意识,促成地方集体主义存在意识的形成,如果该意识已经存在,能够提高其自我意识的程度。而这种弹性政治与当今社会学中的地方概念相当一致,正如一位社会地理学家所说:“地方指社会结构

形成的过程”(Agnew, 1987: 36),这不是指具体化的抽象概念,而是表明,如果不能确定形成一个地方的“外来势力”,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地方的形成过程。在毒性话语中,形成地方的外来势力无疑是指侵入者,对这些不受欢迎者的关注使该地值得一提,环境正义活动家、协调者与读者对此地的关注使其成为被标注的区域。因此,关于地方有何构成的争论还会继续。

毒性话语对具体事件越关注,就越容易产生蒙太奇般的哥特恐怖景象。卡森去超市时,她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毒性远远超出隔壁药店药物的货物上,药房的毒药是在签署一份“毒药书”后才能购买,^③“在一个孩童触手可及之处”,就是一些易碎玻璃器皿,里面装有诱发癫痫症的化学物品,危险还以商品形式跟随购物者到家,比如厨房餐用纸,“它两面沾满了杀虫剂”(Carson, 1962: 157-158)。如今,“去毒化行动指南”中充满了“小心为妙”之类的故事,如尤金·比曼,“一位自谋职业、住在郊区的工程师”,“为节省能源将他的房屋密闭起来”(Lawson, 1993: 82),结果却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又如丹娜·施瑞尔,她把自己反复出现的“心颤和心绞痛”的原因归结为床垫中的“杀虫剂残渣”(Lawson, 1993: 151)。

当比曼和施瑞尔这样的受害者们原则上别无选择时,毒性文本的哥特恐怖性就更耸人听闻。《洛杉矶时报》刊载了以5岁安特温·萨格斯的故事为引子的调查文章,该文反映全球儿童、尤其是城市的非裔孩童中,哮喘发病率提高。安特温在上学时,哮喘发作、呼吸急促,他央求老师帮他,“但她骂他调皮捣蛋,直到最后才发现他不是在做怪胡闹”。“他被送到校医务室时为时已晚,他惶恐不安,双眼突出,充满恐惧,努力往受阻的气管里吸入氧气”(Cone, 1996: A28)。他的妈妈匆匆赶到,“一边与自己的歇斯底里斗争”(同上),一边徒劳地“让深陷于地牢般学校教室里的亲儿子吸完最后一口气,安静地死去”(同上)。这篇报道最骇人之处是它典型地披露了整个青少年受害者阶层的困境,他们以生命诉说在社区、街巷与工作场所发生的一系列悲剧。

就像我们先前提到的毒性话语的具体特点,哥特恐怖意象的先驱者在工业化前期就有。霍伯格(Homberger, 1994: 30)在对战前纽约城“更为底层”的资料研究后指出:这些资料借鉴了“维吉尔模式”:有导游引导参观地狱式的“贫民窟”,将其比作传统经书中所谓的“灵魂迷失者的家园”,以期震慑那些无忧无虑的中产阶级读者,并唤起他们的同情。梅尔维尔把“维吉尔模式”引入对新英格兰工业城镇的描绘,戴维斯把“维吉尔模式”引入对美国内陆地区工业城市的描绘。在大量的新闻报道中也能看到这一模式,如里斯的《另外一半是如何生活的》(1890)、杰克·伦敦的《深渊居民》(1903)。在小说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模式,如狄更斯的《荒凉山庄》(1853)和《艰难时事》(1854)、辛克莱的《屠场》;同样,在早期现代调

查报告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模式,如亚当姆斯的女徒弟、工业毒物学的创始人爱丽丝·汉密尔顿(Hamilton, 1985:145),在她的自传中,汉密尔顿回忆了她在阴沉的一月里,走访密苏里州乔普林的一家铅熔炼厂:“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最无望的社区……村子周围没有一棵树,只有……从浓缩铅的厂区排出的废渣,它们形成巨大的岩石塔和一眼望不到头的细砂带。目睹这些,我想起《旧约》中的句子:‘你头上的天空会变成黄铜,你脚下的大地会变成钢铁。’”

这里我们同样能看到“维吉尔模式”的双重性:提倡将人类重新两极分化,分为被拯救者与被打入地狱者,以使社会获得新生;迷宫中成为向导的人是如此聪慧,而那些迷途者则是那般背运,几乎不再有人样。有时这种带着优越感的关怀是十分小心的,对于富有男子气概的探险家杰克·伦敦和用照相机记录隐秘的里斯,同情可以突然转为轻蔑。狄更斯倒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他相信,世界上所有的戴洛克夫人,其命运与世界上饥饿的乞丐的命运紧紧相连;然而,就像狄更斯与辛克莱都不会明确放弃全角叙事一样,汉密尔顿也不会认为解决工作场所环境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专家与职业经理的联合。

当代毒性话语承袭了这种模棱两可的特性。卡森在每个转折处都依赖科学的权威性。但在《寂静的春天》所描绘的情景中,作者—读者的关系已经发生改变,双方即使不是真实的,也是潜在的毒性地狱的居民。而且,在当代毒性话语中,受害者被允许转变角色,表现权威性。环境正义运动期刊如《种族,穷困和环境》、《E》等,都有代表广大草根阶层的社区代表的证词,配合活动家、调查人员、学者与顾问的证言,这些构成维吉尔式、哥特恐怖场面,这当中当事人的证词成为中心,受苦受难之人因为成为领路人的向导暂时获得自主代理权,地狱篇章本身也有这种特点。

总之,毒性话语的这四个具体特点,无论从其文化承袭,还是其当代衍变,都促成统一的毒性文化的产生;而种族、性别和阶级作为社会差异的指示牌,其重要性日益得到承认,这也有助于确定不同群体在毒性环境中面临的不同程度的风险。卡森被奉为环境正义运动的先知、预言家以及先祖,其作品《寂静的春天》具有示范作用,作品中自我克制、讽刺中不乏分析的语调和纪录片式的审慎,表明该书不仅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乡村/城市居民所创作,也是由具有同样背景的人所创作;该书充满感情地关注全球受害的种种可能性,出版后又历经考验:经历工业界的攻击、之后又被证明正确属实、成为大获全胜的殉道者(其苦难性又因作者很快死于癌症而得到增强),这些都再次表明它是一部具有普世视野的著作,它从世界上每个地方、每个社会群体的受害者的角度,替他们说话,和他们对话,为他们呐喊。

注释

- ① “毒性话语”是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尔的所有环境理论与生态批评文章中引用率最高的一篇学术论文。该文首先发表于美国著名文学评论杂志 *Critical Enquiry* 24 (Spring 1998), 639-665。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翻译了原论文三个部分中的前两部分。
- ② 指靠近少数族裔居住区。
- ③ 指只有持有医生开的处方才能购买药物。

参考文献

- Agnew, J. A. 1987.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Boston: Unwin Hyman.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M. Ritter, tra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eecher, C. 1986. The American people starved and poisoned.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33): 762-772.
- Brooks, P. 1972.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Boston: Fawcett Books.
- Bullard, R. 1990. *Dumping in Dixie: Race, Clas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Carson, R. 1962. *Silent Spring*.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Collin, R. W & W. Harris. 1993. Race and waste in two Virginia communities. In R. D. Bullard (ed.), *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Racism: Voices from the Grassroots*. Boston: Southend Press, 93-106.
- Cone, M. 1996. Leaving a generation gasping for breath. *Los Angeles Times*, 27 Oct.
- Dowie, M. 1995. *Losing Grou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Douglas, M. 1985. *Risk Accept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ublications.
- Edelstein, R. M. 1988. *Contaminated Communities: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Residential Toxic Exposur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Fox, S. 1985. *John Muir and His Legacy: The American Conservation Movement*. Madison: Little Brown & Co.
- Hamilton, A. 1985. *Exploring the Dangerous Trade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Homburger, E. 1994. *Scenes From the Life of a City: Corruption and Conscience in Old New Yor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rley, A. 1995. *Environmental Inequalities: Class, Race,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Gary, Indiana 1945-1980*.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Kempton, W., J. S. Boster & J. A. Hartley. 1995. *Environmental Values in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 Kiker, K. 1990. The Nation's dumping ground. *The Egg* 10 (Summer):17.
- Krauss, C. 1993. Blue-collar women and toxic-waste protests: The process of politicization. In R. Hofrichter (ed.), *Toxic Struggl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s*.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107-117.
- Lawson, L. 1993. *Staying Well in a Toxic World: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Illness, Multiple Chemical Sensitivities, Chemical Injuries, and Sick Building Syndrome*. Chicago: Nobel Press.
- Lee, L. 1991. Energy and air pollution are social issues. *Race, Poverty and Environment* 22 (Summer): 1-18.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D. Nicholson-Smith, tra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Levine, M. 1982. *Love Canal: My 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ewis, V. 1991. Rachel Carson remembered. *Race, Pov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Spring):5.
- Lutts, R. H. 1985. Chemical fallout: 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radio-active fallout, an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nvironmental Review* 9(Fall): 211-225.
- Martin, E. 1991. Organizing for a change: The DOS and DON'TS of fighting pesticides. *Race, Pov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2 (Spring): 47.
- Marx, L. 1964. *The Machines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ir, J. 1907. The Tuolumne Yosemite in danger. *Outlook* (2 Nov): 48.
- Nash, R. 1967. *Wild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egan, R. 1993. Environmental equity: Risk and race. *The Egg* 13 (Spring): 7.
- Szasz, A. 1994. *Ecopopulism: Toxic Waste and the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Weart, S. R. 1988. *Nuclear Fear: A History of Imag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